

资政参考 敬请阅览

视点

第 3 期

镇江市图书馆主办

2012年2月1日

ZHEN JIANG LIBRARY

本期 导读

- ☆官场“酒文化”酿出了什么
- ☆改革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敢说话
- ☆政府守法就是对公民最大的“教化”
- ☆尤需重视“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 ☆背街小巷与治理大道
- ☆北京上海试点农村集体土地建租赁房
- ☆今年农业将主打“八张牌”
-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阅读镇江

镇江名人（八十五）

革命党人——赵念伯(1887—1919)，原名毓驯，字驭六，为赵声大弟。赵光(1890—1929)，原名毓光，又名馨，字翊三，为赵声的二弟。丹徒大港镇人。

两人幼随父读，后念伯考入南京陆师学堂，毕业时部试一等，任排长、队官；光则于南京陆军招募新兵时应征入伍。经赵声引导介绍，均加入同盟会，参与赵声领导的反清活动。赵声受端方迫害离开新军三十三标后，念伯负责声与三十三标中革命志士的联络工作，不久随声去香港。光于清宣统三年(1911)初，亦至声处。黄花岗之役前，兄弟为起义密运武器，传递消息于广州、香港之间，多次冒险入城，几不能脱。起义失败后，避居香港，直至武昌起义，两人至沪召集赵声旧部，组织“先锋队”，策动沪宁各地起义，并参加攻占江南制造局一役。上海“光复”后，洪承点带领千余队员至苏州，准备进攻宁镇；留沪队员由念伯任司令，光任第一大队队长，执行治安警戒任务，并接济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枪弹。民国元年(1912)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光奉命率第一大队赴宁担任大总统的警卫，念伯亦移师镇江，部队改编为三十二旅。2月中旬，清帝退位，南北言和，孙大总统辞职，光亦率部回镇；2月下旬，南京陆军部委任念伯为三十二旅旅长，光为该部六十一团团长。二次革命时，念伯奉命在镇江广贴告示，宣布江苏独立，与黄兴等联名通电反袁，派光率团赴沪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后走亡日本。至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始归乡里。民国6年护法军兴，受陈炯明电召，念伯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议，光任攻泉司令，一同率军增援福建，讨伐当地军阀李厚基。民国8年2月，光与闽南靖国军司令宋渊源意见不洽，陈炯明派念伯往安溪调停，事方息。忽染喉病，仅二日，病逝于漳州赵光行营，时年32岁。其后光离职护柩返里，在家闲居。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时，光任省政府咨议，后任如皋县公安局长。民国18年病逝于镇江。

供稿：镇江市图书馆文献开发部

今年农业将主打“八张牌”

日前召开的全市农业工作会议提出，主打“农民收入倍增、加快转型升级、实施科技驱动、创新经营机制”等八张牌，实现农业增加值增幅 4%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15%以上。

这八张牌是：突出紧扣指标体系，查漏补缺抓推进保进度。即紧扣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一共是六大类 21 项指标。

突出四个重点，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围绕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 15%以上的序时目标，发展农业生产促增收，确保粮食总产在 100 万吨以上，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重点发展优质肉奶、特种水产、高效园艺、经济林业、观光农业等优势主导产业，确保农业增加值达 115 亿元以上。增强创业能力促增收，大力实施农民创业技能培训，全年计划培训 2000 人次以上。壮大村级经济促增收，确保全市村级年收入到 2012 年底达 50 万元以上。扶贫帮困促增收，确保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不低于 4000 元。

突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加快农业转型升级。全年吸引“三资”投农 50 亿元以上，其中 50% 以上投入各级园区。争创省、市两级园区，2012 年新创省级园区 2 家以上、市级园区 10 家，园区建成总面积突破 30 万亩。

突出科技驱动，增强现代农业发展后劲。

突出经营机制创新，激活农业发展内生机制。围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培育和壮大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2012 年，新增“五好”合作社 80 家、新增合作组织入社农户 10 万户，新增农业规模经营面积 20 万亩，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比达 65%。

突出农产品加工和物流，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集约化进程。加强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新建千亩以上农产品基地或园区 10 个以上；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2012 年计划建设高标准农田 5 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比重达 48%；扎实推进农机化，实现水稻机械化种植面积达到 115 万亩，机械化种植水平达到 80% 以上，力争全市在 2012 年基本实现水稻生产机械化。

突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引导健康消费

——摘自《名城镇江网》

焦点关注

官场“酒文化”酿出了什么

中国人在酒文化中浸淫已久。五千年的酒文化延绵至今，伴随经济的大发展而异常繁荣。特别是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享誉华夏的茅台酒已经事实上跻身奢侈品行列。“酒兴”如此这般地畸长，并未使酒之文化气味愈来愈浓，反而使之与“文化”二字渐行渐远，与歪风邪气越走越近。如今在喝酒已成“重要工作”的某些官场，充斥其间的，是浓浓的腐败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有民谣为证：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

“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

“穷也罢富也罢，喝罢！兴也罢衰也罢，醉罢！”

“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

酒喝到这份儿上，还有何文化可言？！

当下官场，不仅几乎是无酒不成席，而且是无好酒不成席。因为是公款吃喝、公款招待，用不着掏个人腰包，所以，酒要档次高，才能显示规格高；酒要喝好甚至直到把人喝倒，才能显示热情。酒不仅被用来勾兑感情，还被用来勾兑业绩、利益、权力甚至情色。有这样一种“理论”：只要没把公款装进个人腰包，吃了喝了算不了什么，有不少人对于在官场多年“吃了个肚儿圆”颇为坦然。

酒本是一种以粮食、水果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或勾兑而成的神奇之物。自古以来，人们用“琼浆玉液”、“陈年佳酿”来赞美酒的品质。酒文化被视为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芳香独特。有人这样描述酒的文化之美：“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景色，“斗酒诗百篇”的激情，“借酒消愁愁更愁”的比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洒脱，“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气概，“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喜悦，“绿酒一杯歌一遍”的心情，“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意境，“红酥手，黄滕酒”的苦痛，“一醉方休”的痛快，《祝酒歌》的豪放，《酒神曲》的粗犷……酒有酒义，亦有酒谋。酒谋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把酒作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酒风日盛且越来越被庸俗化、低俗化

的今天，酒这种醇香清澈之物已被腐败的官场文化“发酵、蒸馏、勾兑”得面目全非：有人设高档酒宴取悦上级，有人以酒送礼谋取私利，有人用劝酒灌酒罚酒作为一种乐趣，有人把命令下属喝酒视为一种权威，有人因嗜酒醉酒而忘乎所以、不理政事、贻误工作、丑态百出，有人不想喝酒陪酒却欲罢不能、痛苦不堪，有人因终日陪酒而伤身害体、家庭不和甚至“以身殉职”，每年因公款吃喝而糟蹋的食物、浪费的钱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从“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到“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中国酒文化特别是腐败官场的“酒文化”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是该清醒地思考一下了。酒可怡情，亦可丧志，还可亡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摘自《人民日报》

吴敬琏：改革要让老百姓富起来敢说话

中国经济最近 30 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 10% 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 3.5 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

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挑战。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中石化 2009 年盈利第一名，原 CEO 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平均每天花公款人民币 4 万元用于个人享受。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这样。

近年来有种倾向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可“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是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员)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

资本收入增长，而资本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长。第二部分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其份额增加，也只能使极富有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以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 1980 年代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民主、宪政问题，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有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摘自《新华网》

政府守法就是对公民最大的“教化”

佛山人大代表方明的一段话近日成了最新“雷人雷语”。据《广州日报》报道，9 日上午，在佛山两会南海区代表团的分组讨论现场，方明说，“百姓是教好的，不是养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溺爱的百姓也可能比较刁民。”

据说方明代表的“主职”是教师，以熟悉的教育来打比方或许源于职业习惯。但方明这段话，真的错了。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达了一个错误的理念。

从报道中可知，方明说此番话，时间是在人大会议期间，地点是在人代会的分组讨论现场。简言之，这是人大代表在履行其职务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所为。作为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民意代言人，人大代表在小组讨论会上应该行使的是对政府的监督权，是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权。百姓是教好的还是养好的，本不是人大讨论的选项。

恰恰相反，把百姓当孩子，是典型的父母官思维。若是一群统治者（而非服务者）相互交流对百姓的管制经验，方明此语，很可能会得到颇多共鸣。但现行宪法规定了“主权在民”原则，人大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政府机构乃至官员的所有权力都源于人大授权，他们应对人大

负责，并向人大报告工作，还需接受人大的监督。在人代会上，代表首先要明确的身份就是——我乃政府工作的监督者，而非管制民众的权术参谋家。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法制建设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刑法时代”，走到了“民法时代”和“行政法时代”。行政法在所有部门法中数量最多，制度构成也最复杂。这是因为法治的核心就在治权——规范并限制权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并没有权力受制于法的传统。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对政府及官员实现法律驯化，才是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关键。也可以说，政府守法就是对公民最大的教化。

这样的图景才更符合民众对人大代表的期许：政府是治好的，不是教好的。就像溺爱的孩子不可能是孝子，公民溺爱政府就可能纵容政府的专横与滥权。抱持这样的理念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才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逻辑起点。代表们理应对照政府在去年的工作报告中对民众许下的愿景，一一审核是否已经实现，而今年的工作报告是否如实表述，各项工作又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之处。这些才是代表们决定审议通过还是决定审议否决的基础工作。

——摘自《新京报》

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

尤需重视“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中国青年报》1月16日刊登王均伟的文章说，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已经过去了20年。

今天尤其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是邓小平提出的“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个要求。20年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多少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啊！我们今天的事业也正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向前推进的。但也要看到，确实有些新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还在不断扩大。

就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几个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为例，一个是关于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当时就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是社会风气问题：“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

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第三个是关于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些在当时就已经露出端倪的新问题，尽管20年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如果以人民满意不满意来衡量的话，就不能不说还有相当多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也就是说，还要继续抓紧解决。

“抓紧”这两个字，分量是很重的。毛泽东就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现实中这样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样子像抓，会议上慷慨激昂，媒体前风光八面，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抓住的现象还在不少环节存在，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新问题，反而会把新问题拖成老大难，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摘自《中国青年报》

背街小巷与治理大道

大城多小巷，很多仅容一二人通过的背街小巷，密密交织，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通道，透出城市生活最底层的气息。因为巷子小，所以车难进，平时不为人关注。在武汉，这样的巷子有883条。

比起数千条城市新建大道，883条小巷并不起眼，但是，当政府大力启动提升小巷环境的“883工程”时，人们发现它牵动的不仅是小巷居民，更赢得了所有市民的心。小巷路面硬化后不再泥泞，窄小空间实施了立体绿化，破旧公厕修缮后焕然一新，这些变化就发生在身边，人们不禁由衷喝彩。近年来，南京、扬州、乌鲁木齐、长沙等城市，也纷纷下大气力改造背街小巷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大工程、大项目遍布各地，领导干部当然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抓大”，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因此轻视小巷里的事情而“放小”。有人说得好，通衢大道是城市的“面子”，背街小巷是城市的“里子”，“面子”可以充分展现一座城市的经济实力，而“里子”的好坏则检测了城市文明水平、宜居程度。在不少地方，背街小巷晴天尘土飞、雨天泥水溅，路不平、灯不明、排水不畅，生活垃圾随处见，这与主干道的高楼林立、光鲜亮丽形成鲜明对比，如同孔雀开屏，人前光鲜，背后难堪；又如绣花枕头塞糠壳，徒有其表。

小巷虽小，意义不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样富有诗意的美景，是产生于小巷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则反映了衙外小巷的民生多艰。小巷是民之所聚、民之所生、民之所呼的地方，焉能疏于查听、失于善治？

城市居民许多住在背街小巷里，弱势群体多徘徊于寻常巷陌，民生话题常在闾阎话短长，对小巷的重视态度与呵护行动，折射出治理者以人为本的理念，表达了城市管理者亲民爱民的真诚，实乃“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生动体现。

没有什么小巷是完全孤立的，通过曲曲折折的小巷，总是可以与城市大道相沟通。小巷通达大道，这是一个富有哲理的事实。在治理城市的思路上，往往在处理大与小、显与潜、人与物的关系中创生智慧。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和协和广场并不是城市的全部，那些小巷和街角的咖啡馆，还有错落有致的民居更为动人，正如一位哲人所说，巴黎由一个个舒适生活场组成，而不是冰冷的石头组合。

在壮观的城市中，小巷可能是不起眼的角落，却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和价值。试想一下，在治理者的视野中，类似背街小巷这样的地方还有多少？在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光环之下，还有不少艰难经营的中小企业；在气势恢宏的示范校、重点校之外，还有艰辛维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少数人狂扫奢侈品之时，更有艰苦度日的低收入群体……

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尤其是在一些“叶子”够大够醒目时，更会让人产生错觉。在高速前进的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治理者们需要警惕对“通衢大道”的狂热追求，多一点小巷意识，多一些小巷情怀，把发展图景向现实难处、人心深处倾力描绘，此为治世的正途大道。

——摘自《人民网》

给代表时间 怎会看不懂预算

提前半个月时间将预算草案交给代表审议，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让人大代表提前介入预算审议，对预算的精细化也能起到倒逼作用。

每年的人大会议上，代表们对公开预算和“三公”经费关注都很多。1月15日下午，在财经委员会预算审查座谈会上，省人大代表叶丽燕建议，希望能够提前半个月拿到预算草案，让代表们能细读一下，不至于看不明白预算。对此，省财政厅厅长曾志权回应说，只要时间够，预算应可提前看。

预算报告从曾经的“国家秘密”，到如今的部分公开，应当说体现了一大进步。但奇怪的是，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抱怨“看不明白”预算，像本次“两会”期间，深圳团就有很多代表反映，当了5年人大代表，还没看明白财政预算。而更不解的是，人大代表看不明白的财政预算，最终都顺利通过了。这意味着有不少人大代表在看不明白预算报告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地投出自己的赞成票，委实有些不该。

代表们看不明白预算，是他们自身专业知识缺乏，还是预算弄得像“天书”所致？原因须一分为二，但恐怕更多出在预算报告的不够细化、公开上。“两会”时间有限，在仓促时间内，审议长达1000页的预算，对代表们来说确实很难。再加上我们的预算只有“粗线条”，缺乏“细纹理”，有人戏言，预算就像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边装，弄得连财税专家都直言难看懂，也难怪代表们抱怨。

因而，人大代表建议提前拿到预算草案，从而有时间细读预算，尽量弄明白预算，不用再“临时抱佛脚”，也算是合情合理的要求，预算制定部门没理由拒绝。在香港，政府会把财政预算草案张贴到地铁口，方便市民随时了解、提出建议。在内地，虽然目前还做不到这一步，但提前半个月时间将预算草案交给代表审议，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让人大代表提前介入预算审议，对预算的精细化也能起到倒逼作用，代表们遇到有不明白的，可以向政府部门或者专业人士请教，搞清楚哪些预算“模糊地带”还没交代得足够明白，哪些预案解释还不够明确……也只有在这种“细抠”下，才能让预算精细化、科学化，代表们才能提出更合理的意见建议，更好地监督公共财政。省财政厅厅长回应称，编制预算草案的时间很紧张，不到每年的11月，收入情况还看不明，也就无法确定下年底的预算。但时间再紧，挤出半个月的时间应该可以。何况在广州，部分人大代表借鉴香港经验，提前介入广州市民政局和人保局的预算审查，已有了成功经验，为何不将这一做法推而广之呢？

预算资金是公共资金，老百姓有权知道纳税人的公共财政资金用到了哪里。代表们提前“预习”预算报告，看懂预算，也是其职责所在。当然，仅提前介入预算还不够，人大代表还应对应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各部门追加的预算是否合理？年底的“突击花钱”究竟花在了哪里？只有加强从编制预算到预算执行中每个环节的监督，才能真正替公众守好“钱袋子”。

——摘自《广州日报》

精英们应学学小崔贴近“草根”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他没有在这个明星云集的场合中接受奖杯，而是到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了一场打工者自办的春节晚会。在这个没有暖气的简陋舞台旁，小崔穿着黑色皮夹克在舞台下候场，不时掏出手机为台上那些并非明星的小人物拍照。

时下为数不少的公众人物，乐于在红地毯上争名逐利，用一些“脊梁”式的头衔，来夸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而崔永元却能躲开荣誉，登上打工者的舞台，手把手地传递快乐。这种诚恳的态度，体现了他对“打工族”这个群体的真心尊重。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达2.42亿，加上拥有城镇户口的打工者，打工族这个群体的数量将会更大。正是这数以亿计的“草根”们，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进步。

然而，急速发展的城市，却没有给“草根”们留下足够的空间。在利益的推动之下，很多文艺作品都打上了“精英主义”的烙印，着力描画高端人群的生活，远远脱离了打工族以及低收入人群的需要。电影电视里，满眼都是流光溢彩佳偶天成的人生，高调鼓吹消费和享乐。而整日为生计奔忙、与家人聚少离多的打工族，看到这些不免黯然心寒。更有甚者，一些娱乐明星还在炮制着恶俗的段子，依靠丑化小人物取乐，变本加厉地伤害着“草根”们的自尊心。

生活压力不断增长，精神诉求无法满足，草根一族的心理健康危机越来越重。据广州市政协有关提案表明，人际交往匮乏、缺乏人情和心灵关怀等因素，让四成的受访农民工出现了心理问题。更多的人表示，他们没有消解精神压力的途径，遇到心理问题唯有“自己排解”。

同样面临新年，精英人士准备着盛大的典礼，分享成功的喜悦；众多打工者却只能守在上，旁观着不属于自己的热闹。阶层的差别，在不同群体之间构筑了一道森然的壁垒，让原本应该共享欢愉的节日，变得泾渭分明。

要想改善这种失衡的局面，固然要倡导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高层次人士尤其是公众人物的姿态，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崔永元这种敢于冲破壁垒的动作，显得尤为可贵。但一个崔永元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应该有更多精英人士站出来，贴近到草根群体中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也许，这些被长期忽视的声音，才是时代的真正主调。

——摘自《大众网》

神州扫描

北京上海试点农村集体土地建租赁房

近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正式披露允许地方试点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房，北京、上海已获批准。记者昨日也从北京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北京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公租房的试点已经获得国土部的批准。

此前，由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供地压力，一些地方开展了集体土地上建设保障房的尝试。北京也提出，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租房，并在海淀唐家岭、昌平北七家等地试点。

由于担心借试点变相建设“小产权房”，国土部对集体土地建设租赁房一直持谨慎态度。去年6月，国土部下发通知，未经国土资源部批准，一律不得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不过国土部也表示，北京的试点已在去年年初时上报国土部，目前试点正在积极推进中。

北京市相关部门一名人士表示，北京的试点确实已经获得了国土部的批准。今年，北京公租房将继续“三多一统筹”的建设管理模式，多主体建设公租房，其中就包括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来建设公租房。

该人士称，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的公租房与“小产权房”完全不同。集体建设用地上建设的公租房，产权仍然为农村集体组织所有，不能出售给个人，只能配租给符合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并纳入统一规范管理。

此外，根据北京公租房政策，公租房的租期一般为3年，最长不超过5年，这也杜绝了以长期租赁的方式变相出售公租房

——摘自《新京报》

网坛一瞥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 2011

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 10 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 80 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 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 10 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来的？

报告指出，它以权力与市场的奇异结盟为特征。“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

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革、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

“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東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在打破转型陷阱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当人们还在为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的时候，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

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

“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 90 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报告最后呼吁，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

“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以上信息均来自权威报刊和官方网站

刊头题字：张甫雄 责任编辑：镇江市图书馆期刊部

地址：镇江市解放路 17 号

电话：84447365 邮编：212001

E-mail: zjtsghk@126.com